

# 日本间谍自述谍报生涯

## 窃听 诡秘的海南之行

20世纪80年代一个炎热的夏夜,海口市一家高级宾馆的豪华套间内,一个略微秃顶的日本男人蹑手蹑脚地拎着皮箱来到窗子旁。他从箱子里拿出一台酷似收音机的机器,熟练地架好机器、对准波长。传出的声音开始有些嘈杂,但慢慢变得清晰。

不知道是因为门外传来了衣服的摩擦声,还是本能使然,这个日本男子突然感到胸口一阵紧缩,神经质地感受到一股从未有过的恐惧感。仅几秒钟时间,他拔下天线,把机器扔到床下,迅速按下电视机的开关,一个箭步冲到床上,看起了电视。两分钟后,急促的敲门声响起。他假装睡眼惺忪地打开了门,两个强壮的男子冲进了房间,环视一周后,其中一人说:“原来是电视。”日本男人心中一阵战栗,但他的脸上仍挂着疑惑的表情,用日语向来者提问,两名中国男子待了一会就走了。

这个日本人就是阿尾博政,日本自卫队派驻中国的间谍。阿尾知道,他差点就大难临头,来人很可能就是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员。

## 接受 地狱般的特种训练

1930年,阿尾博政出生在日本富山县。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一片法西斯狂热中度过的。少不更事的他,很快就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忠实追随者。

1959年,阿尾博政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日本自卫队。等待他的是“地狱”般的训练生活。刚进学校,他就碰上了每年一度的对抗性马拉松竞走,看似平常的比赛,却有一个要求——全体队员必须同时到达终点。“这项比赛要求必须把落后的人员拉着一起到达目的地,这最适合培养团队精神,同时也唤醒超越个人体力界限的能量”。此后,他苦练实弹射击,学会熟练使用各种枪支,刻苦训练匍匐潜入的技巧——在机枪的强烈扫射之下,匍匐爬行70到80公里……

所有艰苦的训练,在阿尾博政面前似乎都成了小菜一碟。渐渐地,他获得了上司的赏识,很快就升为小队长。不久,连队长推荐他

6月初,一本印着“世纪大独家”、“国家持续隐蔽的战后最大禁忌”字样的书摆上了日本各大书店的畅销书架。这本名为《自卫队秘密谍报机关》的书,披露了日本自卫队向中国派出间谍,刺探军情的重大内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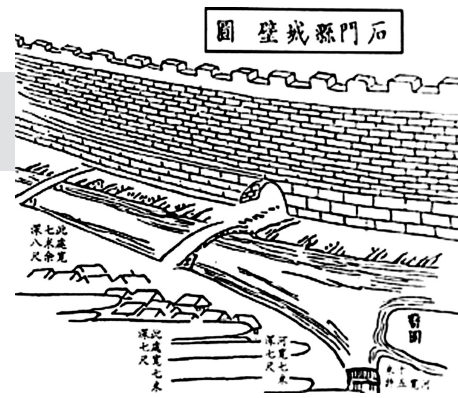
阿尾博政

参加一个神秘的研究课程——特种部队训练。他面对的是更加苛刻的“地狱”训练——美国留学归来的训练员每天都给他们安排超越体力与精神极限的训练项目,比如,一个人在黑熊出没的树海中度过一天一夜;携带1天的食物,进行3天的高强度训练……

一些营员终于因为无法忍受而自杀。但阿尾博政却从不退却,他在多年后仍很感激这段经历:“特种部队的训练培养了我,让我在任何严酷的情况下,也能保持作战的自信。这对我今后作为秘密谍报员十分有益。”

## 老手 成立自己的谍报机构

结束在特种部队的训练后,阿尾博政被分到了一个名为“武藏机关”的部门。这是日美共同建立的谍报机构。他很快接到了第一个任务——以新宿的一间公寓为据点,侦测俄罗



日本间谍清末手绘的石门县城壁图

斯的情报。其间,他施展美男计,骗得一名俄罗斯旅行团女翻译的信任,让她为自己拍摄俄罗斯军事机场的照片。

随着工作的深入,颇有“追求”的阿尾博政感到,自己只不过是美国的一条“走狗”。他多次向上司提议建立日本独立的情报机构。半年后,他的建议终于得到批准。但上司告诉他,“要建立独立的情报机构,你必须辞掉在‘武藏机关’的工作,还要真正退出自卫队。”这意味着他不仅会失去养老金,连工资也没法保证。尽管如此,阿尾博政还是离开了“武藏机关”,并为自己的谍报系统起名为“阿尾博政机关”。

开始时,“阿尾博政机关”主要从事国内谍报工作。为此,他卖过菜,办过洗衣粉销售店,甚至当过运货司机……阿尾博政的隐忍终于得到了回报。1972年3月,他被自卫队上层机关召见。

由于有经济学家的身份,阿尾博政很快就以“民间交流”为借口频繁出入中国内地。一开始,他找不到其他门路,就用秘密相机拍摄中国的街头景象,或到新华书店里搜集中国的各种出版物,并想方设法搞到了一些非正式的出版物。通过日益丰富的人脉,阿尾博政渐渐找到了更多的侦测机会。

## 百年 对华情报战由来已久

阿尾博政为何不惜暴露日本的国家机密,将自己的对华间谍行动写成书?有分析认为,他试图通过此举,让日本政府更加重视对华谍报活动的重要性。在中国不断崛起的新时期,像阿尾博政这样的老牌间谍,一直在敦促日本政府更全面地关注、监测中国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

实际上,阿尾博政在书中披露的情况只是日本对华间谍活动的冰山一角。

日本针对中国的间谍活动从18世纪就已开始。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对中国情报刺探活动达到高潮。1886年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荒尾精中尉秘密潜入中国,将大量在中国活动的日本浪人聚集起来,组织了庞大的间谍网,开始以各种形式刺探中国的情报。后来,他根据成员在中国各地搜集到的情报,编纂成厚厚的一本《清国通商综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交通等诸多方面,为日本军政当局侵华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进入20世纪,日本对华情报战更加猖獗。特别是侵华战争前夕,日本向中国派出了难以计数的谍报人员。比如,日本政府曾派出千余人潜入中国,进行非法测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方面发现,侵华日军使用的军用地图,竟然比中方的军用地图还要精确,重要地段的一棵树、一间房,都被记录下来得一清二楚。

二战后,日本派间谍大规模潜入中国,是在1972年中日建交、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后。他们派出一批精通汉语的谍报专家,通过不断发展与留学生、工程技术人员、专家以及华侨的私人关系,刺探我国情报。

2006年9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曾裁定,两名日本外交官是日本外务省派出的间谍,他们为“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工作,北京高院认定该组织是间谍机构。同年,国家安全局逮捕了《中日经济新闻》杂志的创办人、日本籍男子原博文。他从1995年开始,为日本外务省搜集中国情报,提供了大量中国的机密文件复印件。

另据报道,在日本本土,有一幢大楼专门为广播监听而建,内有8名监听人员全天24小时监听和收录中国中央及地方电台广播节目,并整理、制成卡片,分类存档。

日本亚细亚综合开发研究所近来开设了一种新的服务项目,即向日本商社、金融机关输送各国经济情报信息。

据《半岛晨报》

前史今声·前史今声·前史今声·前史今声·前史今声

据清代大学者戴名世《忧庵集》等古籍记载,有“国粹”之称的麻将牌是明朝时一个名叫万秉迢的人发明的。万秉迢被施耐庵《水浒传》书中的梁山108位好汉所折服,于是想做一副娱乐工具来纪念他们。经过几天精心设计,终于研制出了麻将牌。他把麻将牌设计为108张,暗喻《水浒》中的梁山108位好汉。牌中的九索指“九纹龙”史进,二索指“双鞭”呼延灼等。麻将中万、筒(北方称饼)、索(北方称条),即是发明人万秉(饼)迢(条)的谐音。

## 麻将源于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

万秉迢考虑到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分别来自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又增添了“东”、“西”、“南”、“北”、“中”各4张,共计20张牌。同时,考虑到梁山英雄好汉中既有出身贫民又有出身富户的,对此,就称“贫”为“白”(板)、“富”为“发”(财)。于是,“白”、“发”又各增牌4张,共计8张。最后,便构成了整副牌136张。

由于水泊梁山在宋江的领导下一心想被招安,想与朝廷求和,并不想战胜或打赢朝廷。所以打麻将胜者历来说“和”,而不说“胜”或“赢”。

麻将起源的另一种说法与郑和下西洋有关,在常年的航海过程中,许多将士因海上生活单调枯燥和思乡之苦,甚至积郁成疾。

郑和看了非常着急,他认为必须要制作一种新的娱乐工具,给将士们解除烦闷。经过冥思苦想,郑和就地取材,利用船上现有的毛竹做成竹牌,刻上文字图案,再制定游戏规则,放在吃饭的方桌上就能供四人同时娱乐。在文字图案的确定上,为了迎合将士们的心理和航海的实际,郑和同样动了一番脑筋。

比如:红“中”代表中原大地,迎合将士们的思乡之情,由于中国的帝王一向偏爱红色基调,故特意将“中”字设置成红色。

因为航海的目的是经商,故竹牌刻上“发”字,以迎合大家的发财心理,发多少财?“一万”、“二万”、“三万”……“九万”。

由于航海中受食品来源制作条件的限制,将士们的日常主食是烙制的圆形大饼,吃多少饼?“一饼”、“二饼”、“三饼”……“九饼”。

遇到风平浪静时,将士们也常捕鱼来改善伙食,捕多少条鱼?“一条”、“二条”、“三条”……“九条”。

船队在海上航行,将士们整天看到的是一片白茫茫的沧海,故竹牌中设置了“白板”。

郑和当年航海使用的是帆船,所以最关心的是风向,故竹牌刻置了“东”、“南”、“西”、“北”风。长期的海上航行,人们感受最深切的是季节冷暖的变化,干脆就刻上“春桃”、“秋菊”、“夏荷”、“冬梅”四朵花来代表一年四季。郑和发明的这种新式竹牌娱乐工具,不像“围棋”、“象棋”那样深奥难学,普通士兵一学就会,很快就在将士中推广开来。

后来一些将士们向郑和反映:这种竹牌太好玩了,大家都非常喜爱,将士们一玩起来就精神麻木、如痴如醉,不仅乐不思乡,而且有时连饭都忘了吃。但大家都把玩这种游戏叫打“竹牌”,名称不太雅观,还是请主帅另赐一个名字吧?郑和想了想回答:既然这种游戏能够麻痹将士们的精神,那就叫做“麻将”好了。

从此,“麻将”的名字就产生了,而且由海上传到陆地,打法也不断花样翻新,逐渐成为中国人的主要娱乐工具。

据《读者报》

## 宋朝的时尚养生清单

《朱子文钞》卷四十二中,有一封家信,信中说,“慈母年高,当以心平气和为上。少食勤餐,果蔬时伴。阿胶丹参之物,时以佐之。延庚续寿,儿之祈焉。”

信中提到的养生之道有三个要点:第一是劝告老年人增进精神修养,保持良好平和心态;第二是注意饮食方式及营养结构;第三是在正常饮食之余,进行必要的补充,而阿胶丹参就是最相宜也最适合持续服用的日常滋补物。

写下这封家书的“朱子”,就是中国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儒”朱熹。说到大儒,读过孔孟著述的人们会有个疑问,所有儒生的祖师爷孔子,一再强调简约生活与吃苦精神。后世大儒朱熹,却让母亲又是“果蔬”又是阿胶丹参的,是不是太奢侈,有违圣人教诲?

实际上,孔老先生也并非无条件地主张苦修,他也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时候——这两句可是孔子的“夫子自道”,是对他自己的描述。可知,既然宋代理学大师朱熹自认为是孔门超级继承者加发扬光大者,他在家信中大谈饮食养生,也算是高扬儒家饮食文化的旗帜。

以朱熹的身份和水准,他这可不是鸚鵡学舌。简单介绍一下,朱熹作为一代宗师,他对读书人人生价值及实现途径给出了一个最经典的概括,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他对人们如何认识世界,也给出了一个同样经典的哲学范畴,曰“格物致知”。通俗地解释“格物致知”,便是以研究所有客观事物为起点和基点,提炼出关于客观世界的真谛与解说。

朱熹劝告于母亲的,他自己当然也会加以实践。果然,他寿至71岁。这岁数在今人看来,也许没什么了不得,但别忘了那是宋代,尤其对于一个呕心沥血做学问的人来说,71岁够上难得的高寿了。

朱熹给自己慈母开出的那张养生清单,没有随着历史进步演变为“无稽”或“荒谬”,我们今天主流的“健康食谱”,与这清单基本大同小异。

很容易注意到,朱熹这份养生食谱里,主打一是果蔬,二是阿胶丹参。这就有个问题,作为家常食物,果蔬比较寻常,就算不懂养生,也都少不了食用。但阿胶丹参之类,就相对昂贵了,如果要“时以佐之”——持续滋补的话,不是普通百姓所能做到。

原因在于,朱熹本不属于普通百姓啊!准确地说,这清单透露出大宋时代上流社会养尊处优活得细致滋润的实况。阿胶丹参之类,是当时生活品位的一个象征,是一种时尚的基本元素。

从这个意义上,祖师爷孔子虽然门徒三千,但其物质生活质量和朱熹比起来,只能自叹不如。因为在当时,朱熹的学说已经红遍朝野,门生也遍布天下,到了明代,朱熹思想干脆成为书生的必修课程,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必然工具与手段。

这就不难理解,他的养生思想以及养生食谱为什么对后世影响深远了。“阿胶丹参之物,时以佐之”,朱熹认为经常服用这两样,可以达到“延庚续寿”的目的。而他本身的高寿,宛如对他理论的生动注解。

据《周末》